Globethics Repository



第二屆中國和中亞的景教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Chen, Huaiyu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16 04:25:45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917

第二屆中國和中亞的景教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陳懷宇
美國西來大學助理教授
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

由薩爾茨堡大學霍夫力（Peter Hofrichter）和聖奧古斯丁華裔學志社馬立凱（Roman Malek）兩位教授組織的中國和中亞的景教會議是世界上僅有的討論景教的會議，曾經在二〇〇三年舉行過第一屆。但是因為亞洲地區爆發了SARS，不少中國學者缺席會議。筆者沒有參加第一次會議。這次於二〇〇六年六月一日至六日在薩爾茨堡幽靜的聖維吉爾會議中心舉行的會議是第二屆，贊助單位包括奧地利聯邦政府教科文部、Pro Oriente 基金會、薩爾茨堡大學東方基督教研究所、華裔學志社等單位。參加的學者來自德國、奧地利、英國、法國、意大利、丹麥、荷蘭、斯洛伐克、中國、印度、美國，其中以中國學者最多，既包括有大陸、香港地區的學者，也有目前遊學海外的青年學者，但一些重要的中國景教學者沒有到會，這包括經常在會議上被提到的林悟殊、耿世民、蓋山林以及研究泉州景教碑刻的學者。而中亞景教研究的著名學者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雖然接到邀請，但目前人在中亞地區，也未能與會。最後的程序單上顯示，學者們總共提交了三十篇論文，德國哈雷的圖巴赫（Jürgen

Tubach）、圖賓根的托佩爾（Alexander Toepel）、柏林的王丁等先生提交了論文，但人未到場。經過上次會議的討論，已經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即不再使用 Nestorianism 作為景教的名稱，因為該名稱乃是主流教會對東方敘利亞教會的蔑稱，故而學者一般均使用「景教」（Jingjiao）或者 The Church of the East，或者 Syriac Church；偶爾有學者為了簡便仍然使用 Nestorianism。因會議語言為英語，這次會議上大家多使用 Jingjiao 一詞成為一景。由於這次會議適逢莫扎特誕辰二百五十週年，會議組織者特地安排與會者聆聽了米拉貝爾宮的音樂會表演。組織者還安排了薩爾茨堡大教堂的彌撒儀式觀摩，讓與會者體驗了一次豐富的薩爾茨堡文化宗教之旅。

這次會議雖然主題是中國和中亞的景教，但重點是中國地區的景教，以材料而言，着重在長安的景教碑，敦煌景教漢文文書，新疆地區的景教文獻、內蒙古地區景教遺跡、泉州景教遺跡，還有一篇文章討論印度南部東方教會的敘利亞文銘文。以下按照日程安排和分組討論介紹一些論文，依據論文的內容本文評點有些詳略差別。六月一日開幕第一天晚上由薩爾茨堡大學《聖經》研究和教會史系系主任溫克勒（Dietmar W. Winkler）發表題為「一戰後至今伊拉克東方敘利亞教會發展簡史」的演講。他的論題和本次會議主題不是直接相關，但他特別強調東方教會現在仍有十分活躍的四大派別，包括擁有約三十八萬五千人的亞述東方教會（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約五到七萬人的古代東方教會（Ancient Church of the East）、約四十萬人的迦勒底天主教會（Chaldean Catholic Church）以及約三百八十萬人的印度敘利亞馬拉巴爾教會（Syro-Malabar Church）。這些教會成員目前散居在世界各地，特別是中

東、印度、歐洲、澳洲和北美的芝加哥地區。溫克勒先生提醒聽眾，目前伊拉克地區的東方教會成員的處境令人擔憂。二〇〇三年開始的伊拉克戰爭已經迫使約七萬名基督徒逃離伊拉克，留在伊拉克的基督徒則常常面臨生命威脅。

六月二日的會議主要圍繞景教史展開。圖巴赫先生沒有與會，但提交題為「使徒聖多默的傳教場」（The Mission Field of Apostle Thomas）的論文。這篇短文回顧了景教在波斯地區的發展簡史，提示了葡萄牙語史料和印度南部文獻中提到聖多默到中國傳教和建立教會，並猜測景教碑中的阿羅本是粟特人。接下來是劍橋大學敘利亞文專家亨特（Erica C. D. Hunter）的〈波斯對中國景教的貢獻：西安府景教碑敘利亞銘文的探討〉（The Persian Contribution to Christianity in China: Reflections in the Xi'an Fu Syriac Inscriptions）研究了景教碑上用福音體敘利亞文書寫的銘文，逐行結合一些景教史知識和前人比如伯希和、佐伯好郎、多維利耶（J. Dauvillier）等人的研究成果給予解說。比如她指出 Yazedbourzid（中文名伊斯）來自帕拉維語，意指為上帝拯救；而他父親的名字也為一位波斯殉道者所用。這證明其波斯淵源。事實上，多維利耶早已經全面研究了這些敘利亞文銘文，並指出許多波斯因素，比如亨特也提到的 Kumdan 是伊朗和阿拉伯文史料中指唐帝國首都的名稱。但亨特的貢獻在於更為細緻的討論，以及提供了許多相關的中亞景教史知識。她還指出像 Sabrisho 和 Henanisho 這樣的名字在敘利亞文人名中十分常見，實際上是閃米特名字；有些名字綜合了波斯和閃米特來源，如 Iso'dad；有些名字完全是波斯來源，如 Mahdadgusnasp、Izadsepas。她認為那些帶有中文對應名字的人可能是漢

人，而且她推測那些外國人可能為了融入中國也取了中文名字。但她承認無法討論種族的劃分。她推測那些沒有中文名的上層教會人員可能來自 Thomas of Marga 所撰 *Historia Monastica* 中描述的 Beth 'Abhe 的景教寺院。筆者認為關於種族的猜測有些問題，實際上帶有中文名字的人員可能也是波斯人。如榮新江先生在〈一個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1]一文中認為，漢文名為文貞的所謂景教人士即是波斯人李素。筆者認為另一人 Iso'dad 景福可能即是文貞之子，波斯人無疑，而另外一人靈壽（以敘利亞文'nošˁ出現，其實是中世波斯語，意為長壽）也是波斯人。[2]亨特文章的最大缺陷在於沒有結合漢文和敘利亞文名字參照討論。當然要找到一位通敘利亞文、中世伊朗文和漢文的學者很難。接下來的一篇文章是克萊恩（Wassilios Klein）的〈大絲路景教中的政教關係〉（State and Church Relations of the Nestorians on the Greater Silk Road）。他是波恩大學前比較宗教系系主任克里木凱特（H. J. Klimkeit）的學生，但目前專攻中亞景教，曾以《十四世紀前至吉爾吉斯斯坦貿易之路上的景教》（*Das Nestorianische Christentum an den Handelswegen durch Kyrgyzstan bis zum 14. Jh.*; Silk Road Studies 3; Brepols, 2000）一書獲得 Alexander-Böhlig 獎。他的論文簡單描述了十三世紀以前涉及基督教的四種政教關係模式：羅馬帝國時代是忠於帝國但保持距離、君士坦丁大帝時代帝國的統一和教會的統一互相依賴導致一種和諧關係、在東方地區政權和教會各自強調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而在西方地區政權和教會則強調相互之間的差異。接着唐莉的論文〈關於信奉景教的乃蠻和屈出律汗的中世史

1. 載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238-257。
2. 參見拙作《景教在中古中國之命運》，《華學》第四輯（2000），頁 286-298。

料〉（Medieval Sources on the Nestorian Naiman and Küchlüg Khan），補充了一些中世紀基督教和穆斯林史料。唐莉於二〇〇二年出版她在圖賓根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國景教史及其漢文文獻》（*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Its Literature in Chinese: Together with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Dunhuang Nestorian Documents*;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2; revised ed., 2004）一書，提供了敦煌出土漢文文獻的最新英譯本。接着意大利青年學者寶利羅（Maurizio Paolillo）發表〈汪古部的喬治：漢文和西文史料中內蒙十三世紀的景教王〉（George of the Ongut: A XIIIth Century Nestorian King in Inner Mongolia According to Chinese and Western Sources）。這篇文章除了一些和蓋山林的討論略有新見之外，並沒有超出伯希和（蒙古與教廷）和陳垣一些論文的成績，沒有把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意大利熱那亞大學合作在阿倫蘇木或趙王城的考古成績結合進去。下午的討論包括一些簡述和藝術史研究，如澳洲悉尼大學教授佩里（Ken Parry），和美國賓州印第安納大學博士生嚴曉靜主要介紹了泉州和敦煌等地的景教藝術。托佩爾缺席會議，他的論文提供了十三、十四世紀韓國地區景教的情況。印度學者特科帕蘭皮爾（Jacob Tekeparampil）介紹了印度南部敘利亞教會中的一些敘利亞文銘文。新疆社科院語言所的米娜娃介紹了新疆的景教史概況。傍晚時分的兩篇論文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先是文物出版社葛承雍先生的〈景教歌詠音樂在唐元時代的傳播與影響〉一文。這篇文章探討了景教入華之後可能舉行的儀式及其音樂運用，作者認為景教來華當使用過教會音樂。這一論文引起學者們的興趣。霍夫力教授指出管風琴在教會音樂中出現較晚，約在第八世紀，因此不太可能在唐代

即傳到中國。接着陝西師範大學宗教研究中心的彭滿圓博士發表〈Monumenti Sinici 一篇值得注意的漢文聖歌〉（Monumenti Sinici – A Remarkable Chinese Hymn）一文，發掘了一六七二年完成的一篇帶有五綫譜曲譜以景教碑碑文為歌詞的聖歌。這個聖歌的完成有個有趣的歷程，首先是明代天啟年間景教碑被發現，接着一六六七年由耶穌會士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在博伊姆（Michael Boym）幫助下翻譯成拉丁文。隨後一六七二年由新教神學家和東方學家米勒（Andreas Müller）把碑文音譯出來並譜上曲。Monumenti Sinici 聖歌除前奏和結尾之外，分成二十四首歌。彭博士指出這首歌的創作初衷是為了幫助歐洲人學習漢文。

六月三日的會議主要圍繞景教文獻和中國的景教接受史。首先是筆者發表〈唐代景教文獻《三威蒙度讚》和佛教文獻《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的語言學聯繫〉，研究了所謂景淨譯《三威蒙度讚》及闍賓三藏般若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之間存在的用語和句式之間的相似性，並指出後者可能借鑑了前者，因後者晚出。這可能是高楠順次郎指出的景淨與般若合作譯經之後的又一個二者存在關聯的例證。本文英文版已經收入馬立凱主編的第一次景教討論會文集，中文版將發表於朱玉麒主編的《西域文史》。接着來自中山大學的博士生殷小平發表〈從《大興國寺記》看元代江南景教的興起〉一文，文章考察了馬薛爾吉思建立七寺的歷史背景，認為元代鎮江景教徒多來源於隨蒙古軍南下的色目人，存在宗教移民的傾向。殷小平是林悟殊先生的學生，專攻元代景教。隨後柏林科學院的茨默（Peter Zieme）先生發表〈布拉伊克出土雙語祈禱書札記〉（Notes on a Bilingual Prayer Book from Bulayik）一文，研究了一件

吐魯番出土的敘利亞－回鶻突厥文景教文書（U 338, T II B 41, No. 1）。這件文書中出現「基督徒」一詞 är[i]käküt，即蒙元時代漢文史料中的「也里可溫」。對於「也里可溫」一詞的起源，他指出這個詞首先出現在回鶻文和蒙古文文獻之中，即先以回鶻文和敘利亞文字出現，後來出現在蒙文和八思八文之中。亞美尼亞和波斯文中也使用這一詞。已故回鶻突厥文專家哈密屯（James Hamilton）認為可能來自希臘文 archegon。在這一文書中他還發現有 Bäküz 一名，來自拉丁文 Bacchus，酒神。這個名字流行於景教徒之中。文書還提到功德迴向，可見佛教徒和景教徒都相信這一教義。茨默最後轉寫和英譯了這篇文書。接着香港大學的姚志華先生發表〈漢文景教文獻的《四福音合參》式讀法〉（A Diatessaronic Reading in Chinese Nestorian Texts）一文。這篇文章是若干年前姚先生在波士頓大學的碩士論文，認為漢文景教文獻《序聽迷詩所經》可能是《四福音合參》的中文版。這篇文章非常細緻地研究了《序聽迷詩所經》中所反映的神學思想，並與西文中的《四福音合參》內容作了比較。但因為《序聽迷詩所經》本身是否偽作仍然存疑，[3]且對《序聽迷詩所經》的題名解釋頗多異議，姚文中提示的問題尚需考慮。比如任教英國卡迪夫大學的德國學者寧梵夫（Max Deeg）即質疑所謂《序聽迷詩所經》可能指的是聆聽《迷詩所經》的序文。筆者提示其實吳其昱先生已經考證過敦煌寫本《尊經》中的經文名稱來源。[4]筆者還注意到在吐魯番布拉伊可遺址發現的景教寫本包含有四種福音書的片斷。[5]下午的會議一開始則由意大利青年

3. 參見林悟殊，〈高楠氏景教《序聽迷詩所經》真偽存疑〉，《文史》55（2001），頁 141-154。
4. 見〈唐代景教之法王與尊經考〉，《敦煌吐魯番研究》5（2001），頁 13-57。
5. 〈高昌回鶻景教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4（1999），頁 165-214。

學者尼可林尼－贊尼（Matteo Nicolini-Zani）發表〈耶穌會的景教：十七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對唐代景教的挪用研究〉（Jesuit Jingjiao: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ppropriation" of Tang Christianity by Jesuit Missionar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一文開始。他把景教碑的發現史分為石頭的故事、石上的故事和石外的故事三類，對景教碑的理解不同，使用不同，讀法也不同，所以產生了所謂耶穌會讀法、新教讀法、跨文化讀法、道教的讀法。這篇文章的重點是石外的故事，即耶穌會士如何利用景教碑為自己的利益服務。這個研究很有現在日益興起的傳教士漢學的趣味，值得注意。接着發言的是薩爾茨堡大學博士生侯昕。她的論文〈陽瑪諾景教碑頌正詮〉也是傳教士漢學的取向，這篇文章是她博士論文的一部分，首先介紹了陽瑪諾的生平和有關文獻，隨後對陽瑪諾的注解作了一些簡短的文獻分析。有關陽瑪諾這篇重要的景教碑注釋的總體研究，讀者可以期待作者的博士論文最終完成。丹麥的學者米科爾森（Gunner Bjerg Mikkelsen）發表〈有關景淨在景教碑和其他漢文景教文獻中對佛教術語的使用的若干問題〉（Notes on Jingjing's Use of Buddhist Terminology in the Xi'an Inscription and Other Nestorian Texts）一文，探討佛教術語的問題，但景淨到底在何種程度上可看作是這些景教文獻的作者仍有問題。隨後是寧梵夫發表〈唐代景教文獻上下文化待走和未走之路徑〉（Ways to Go and Not to Go i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Jingjiao Documents of the Tang Period）討論了一些翻譯漢文景教文獻的方法論問題，特別是有關景教文獻中反映的政治、社會文化以及文學問題，他提出閱讀景教文獻必須注意現存若干景教文獻的內在相互關聯，比如景教碑使用的修辭所反映出來的政治與宗教

宣傳；以及如何理解景教文獻中的借詞，是綜合他教內容還是採用他教術語等等；景教和其他宗教特別是佛教的關係；以及中國景教與波斯文化的關係。最後，他還推測景教碑中的阿羅本可能來源於伊朗語 Aradabān，意為「律法所保護者」。寧梵夫的探討採文化批判角度，批判了佐伯好郎以及其他景教研究先驅者的帶東方主義或基督教色彩的景教研究，是近來反思近代漢學研究學術在景教領域的延伸。他和筆者、姚志華一樣，是與會者中少數既研究景教、又研究佛教的學者。他目前進行漢文景教文獻的德譯工作，完成之後將由華裔學志社出版。

六月四日上午，全體與會者參加薩爾茨堡大教堂彌撒。下午開始的會議主要集中在敘利亞文墓石銘文。首先由劍橋大學的狄更斯（Mark Dickens）先生發表〈塔什干歷史博物館的敘利亞文墓石〉（Syriac Gravestones in the Tashkent History Museum）一文，介紹了二〇〇三年重開的塔什干博物館展出的四件來自楚河河谷的敘利亞文墓石，這很大程度上是沙俄學者基沃爾松（D. Chwolson）工作的繼續。然後新疆大學的牛汝極和新疆行政學院的李崇林兩位則發表題為〈新疆阿里麻立克景教銘文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Nestorian Inscriptions from Almaliq, Xinjiang, China）一文，轉寫、翻譯和研究了三件來自阿里麻立克的敘利亞文墓石銘文。隨後牛汝極先生單獨發表了〈七河地區、內蒙和泉州景教銘文的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Nestorian Inscriptions from Semirechie, Inner Mongolia and Quanzhou）一文，轉寫翻譯三件來自三個地區的敘利亞文墓石銘文，試圖找出一些三個地區景教發展的共同特點。牛先生認為這三地的銘文使用一種字母，即福音體的敘利亞文字母，均使用突厥語或敘利亞－突厥

語，墓石上均使用蓮花座上有十字架的紋樣，銘文內容結構相同。

六月五日的討論圍繞景教考古。首先由斯洛伐克科學院的老漢學家高立克（Marian Galik）介紹了他去西安盩至尋訪大秦寺的經歷（My Pilgrimage to Daqin Si in China）。接着荷蘭萊頓大學畢業的學者查林（Tjalling Halbertsma）發表文章〈內蒙景教遺址發現的石刻圖像與田野考察筆記〉（Some Field Notes and Images of Stone Sculptures found at Nestorian Sites in Inner Mongolia, China）介紹內蒙四子王、阿倫蘇木、百靈廟地區的景教雕塑。他已經有成果發表在《華裔學志》。[6]彭滿圓先生接着展示了他在西安盩至所謂大秦寺遺址地區找到的一些龍型雕塑，但葛承雍先生立刻指出就製作工藝和紋樣風格而言，這些遺物年代一定晚於唐代，不是唐三彩，不可能出自大秦寺。法國學者馬松（Pierre Marsone）發表題為〈何時房山十字寺是一座基督教寺院：直面當前觀點〉（When was the Temple of the Cross of Fangshan a Christian Temple: Confronting the Present Points of View）的論文重新討論房山十字寺，首先他介紹了意大利學者波旁（Pier Giorgio Borbone）的觀點認為房山十字寺在元代已經成為景教寺院，[7]補充了徐苹芳論文中的資料，隨後支持了楊亦武在《房山歷史文物研究》（北京：奧林匹克出版社，1999）中認為的房山十字寺唐代即已存在的推斷。這個推斷很成問題，目前並不能得到堅實的史料證據支持。最後發言的是吐魯番博物館館長李肖博士，他在〈吐魯番地區的中世基督教寺院遺址〉一文中介紹了

6. Tjalling Halbertsma, coauthored with Wei Jian, "Some Field Notes and Images of Stone Material from Graves of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Inner Mongolia, China,"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LIII, 2005, pp. 113-244.
7. "I blocchi con crodi e iscrizione siriaca da Fangshan," *Christiana Orientalia Periodica*, 2006.

布拉伊克遺址的現狀，並通報吐魯番考古學者將重新發掘這座遺址。這一通報引起景教學者的諸多期待。

在最後的討論中，這次會議與會者決定下次將圍繞景教和其他宗教的關係展開討論，以便深入了解景教在中國和中亞發展的歷史。